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 (A刊) 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全文版) 收录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A)

2026. 2

VOL.19 NO.2

# 公共行政 评论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  
(A刊)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期刊

4月15日出版

2026年第2期 总第110期

## ●专栏：公共服务创新与服务效能

中国公共服务40年的政策变迁与创新：基于知识图谱的分析

..... 郭宁 姜晓萍 1

政民距离如何影响公民满意度：基于全国代表性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 杜娟 李子妍 朱旭峰 19

网上政务服务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感？

..... 杜亚斌 马亮 38

## ●论文

政策再设计的策略类型与生成机制：基于生育政策变迁的过程追踪分析

..... 满小欧 杨扬 59

微观叙事政策框架下的政策认知与认同

..... 莫启星 邵梓捷 78

“党领协作”：党建统筹下重大项目的协作模式与组织机理 .....	王 铮	95
街区治理共同体：城市基层治理的场域扩张与主体重塑 .....	顾丽梅 李雨荃	114
基层政策执行如何化解“棘手问题”：基于房屋征收事件的案例研究 .....	林 彬 文 宏	134
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能否预防腐败：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	刘巧兰 骆 飞 王丛虎	155
<b>●理论综述</b>		
地方官员的任期效应：研究综述与展望 .....	李 璨 王雨洁	176
<b>●英文目录与摘要</b> .....		196

# 街区治理共同体： 城市基层治理的场域扩张与主体重塑

顾丽梅 李雨荃\*

**【摘要】**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街区日益成为与社区同样重要的基层治理节点，但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着如何将分散逐利的商户凝聚成紧密关联的集体之困境。论文围绕上海市C街事会这一街区治理样本，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搭建“一链双环”分析框架，廓清了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路径与创新机制。在“身份-情境”的基础环中，街事会借由“标签化”的角色塑造培育商户的街区认同感，通过空间营造以及参与者的物理在场有效增强商户的集体意识。在“议题-情感”的动力环中，街事会在协商互动中聚焦共同议题，凝聚情感认同，促进治理动能释放。通过角色重塑式的主体激活机制、循环下沉式的动能注入机制以及引领托底式的制度保障机制，街事会的实践为在市场逻辑与公共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点提供了支撑，打造了一条从分散到整合、从工具互动到情感关联的城市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本土路径。

**【关键词】**街区治理共同体 基层治理共同体 互动仪式链 城市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2-0114-20

##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习近平，202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习近平，2018：95）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大量社区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成功实践，从微观层面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宏观命题进行了有效回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渐深入，城市空间形态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特征，

---

\* 顾丽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通讯作者：李雨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数智赋能研究”（25&ZD153）。

商业街区逐渐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新焦点。虽然同为社会基层单元，但街区与社区的治理内容存在较大差别，传统社区治理机制难以有效覆盖，街区共同体的形成与运行也难以简单套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本研究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构建“一链双环”分析框架，以上海“街事会”为对象，探讨街区治理共同体如何扩展基层治理的实践空间，拓宽基层治理的参与实体，以回应“在当代高度市场化、流动化的城市街区空间中，何以突破利己逻辑，培育具有情感韧性的协作治理共同体”之问。

## 二、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 （一）问题提出

伴随城市空间形态的更迭演变，街区、园区、楼宇等新兴治理场域正逐渐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街区承载着商业服务、公共交往、风貌展示等多重社会经济功能，是城市经济生产与居民生活的重要载体（耿虹等，2022）。日益发展的街区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拓展了新的空间视野，进一步丰富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

然而，在现实中，商户间因缺乏有效协同而陷入利益困境的现象屡见不鲜。共享单车堵塞店铺入口、“门前三包”责任不清引发矛盾、外摆经营无序竞争……种种因公共空间管理失序、规则缺失引发的矛盾凸显了构建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复杂性。育成街区治理共同体为何如此困难？从空间维度看，城市街区开放性极强，缺乏明确的地理边界，街区商铺密集、人流熙攘，流动性极高，难以形成如社区般稳定的地缘纽带；从主体维度看，城市街区内商业主体数量庞大且类型多样，涵盖了从传统零售到新兴产业的各种业态，经营者与消费者、雇主与劳动者的关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矛盾冲突时有发生，利益诉求呈现高度异质性；从管理维度看，大多数街区缺乏社区中常设的居委会、业委会等自治组织，一些自发形成的商户联盟缺乏法定地位和明确的职责边界，决策效力和约束力不足，动员机制缺位。综上，若仅靠经济刺激来强化街区主体的公共性意识，只能实现商户的短期参与，难以维系其长久合作，而纯粹靠行政命令又难以适应多元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因此，必须超越物质激励与制度约束，搭建利他性情感纽带，真正突破共同体的建构与行动困境。

近年来，伴随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工作的纵深推进，商业街区开始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上海、杭州、深圳等地均开展了大量街区治理实践。以上海市为例，2024年以来，上海在全市推开新兴领域党的组织体系全覆盖攻坚行动，形成以街区党组织兜底为主，结合实际灵活建立各类实体性党组织的基层治

理新路径（巨云鹏，2025）。在一系列街区治理的探索实践中，“街事会”作为一种协商治理机制，有效整合了街区内部的分散力量，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街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样本。聚焦上海市以“街事会”为手段推进街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有两个核心问题亟待探究：第一，在商业利益主导的街区环境中，如何通过情感连接机制打破个体商户之间的隔阂，促使其主动参与街区治理？第二，如何建立能持续激发情感能量、强化集体认同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增强街区治理共同体的长期稳定性？

## （二）文献回顾

### 1. 共同体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共同体”（Community）的理念本质。共同体理论经历了由“自然共同体”向“建构共同体”的历史演进。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将共同体理解为一种基于血缘、地缘的情感纽带（滕尼斯，2019）。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正是通过共同的生活空间、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密切的社会互动，自发形成稳定的情感纽带和认同归属。然而，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市场逻辑与自然共同体的存续产生根本冲突。作为社会学的经典概念，传统共同体理论在现代社会原子化、流动性加剧等的冲击下逐渐失去解释力，古典共同体被消解（汪民安，2020）。为了回应传统共同体解体带来的社会整合困境，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开始关注如何在现代社会重建合作机制。协同治理、集体行动、合作生产等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和网络协作的理论逐渐兴起（Ansell & Gash, 2008；奥斯特罗姆，2012；Parks et al., 1981），而共同体作为个体、组织等基于相似的价值认同、目标追求，自觉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群体（郁建兴，2019），其所强调的价值共识、集体行动与互惠合作，与上述理论的核心关切形成了暗合。这些理论不再局限于追问“共同体是什么”或“共同体如何形成”，而是关注如何让分散的主体协同起来，如何设计有效的合作机制。由此可见，尽管已有研究存在对“共同性”的持续关注，但西方研究的关切仍存在功能主义的取向，其目的在于探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激励机制促成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解决某个具体的公共问题，而非探讨如何培育或重建具有情感纽带、价值认同和归属感的共同体这一社会结构本身。

“共同体”一词在中国语境中兼具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话语建构的双重面向，这赋予其发展成为一种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治理目标的潜能。在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共同体是包含了“家-社会-国家-天下”的有机整体，表现为血缘、伦理和文明秩序的层层扩展，这种差序式的共同体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方式（胡安宁，2024）。随着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的提出，“共同体”这一传统概念的应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展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宋辉、张梦康，2025）。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清晰的政治话语和治理目标，强调通过治理实践来整合分散的社会主体，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机制（徐勇，2024），因而能有效回应现代社会的原子化、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基层治理面临的认同危机与协作困境。总而言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实现了对传统共同体研究的借鉴与本土化转化，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和实践框架的建构（唐文玉，2023）。

在当前中国的实践中，社会治理共同体依托社区、乡村等基层空间，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和治理特点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吴理财，2020）。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建立在一定的治理空间范围内、拥有特定的治理载体、具备资源整合能力的多元要素汇集的组织化链接形式（文宏、林仁镇，2022）。既有关于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研究主要关注结构层面的社会主体关系整合，以及心理层面的价值共识建立等内容。主体关系整合研究往往聚焦多元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与利益协调机制，探讨了党建引领下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样态（李沫，2023）、组织结构重构与权力分配（吕普生、张晓文，2024）等内容。情感共识建立则关注认同感形成机制以及公共性拓展，探讨了情感黏合（苗大雷，2024）、责任共担（张力伟、李宇晗，2024）等推动情感生成的关键因素。

## 2. 街区治理

当前，街区成为城市基层的新兴治理场域。就其概念而言，街区既可用于描绘区政府、街镇与社区之间的关系（陈水生、叶小梦，2021），也可以指突破了传统社区边界的、居民社交生活的物理载体与文化交汇的社会空间（徐越倩、许文颖，2024）。此外，街区作为一种与封闭小区相对应的开放式社区形态，代表了城市空间转型的一种发展趋势（吴晓林，2016）。与街道、居民区不同，街区并非由基层政府划定，不具有行政性质，而是自然形成的，实现商务区和居民区联动的商业功能片区，这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概念视野。根据这一定义，商业主体成为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主体。然而，商业主体通常被视为理性经济人，其行动逻辑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这似乎与共同体所需的情感联结、价值认同等要素相矛盾。在此矛盾下，为了探究“街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这一命题，现有研究主要从理性的利益整合和感性的情感认同两个维度进行探讨。

在理性层面，制度化利益整合机制推动街区经济共同体的构建。地理空间的集聚性和商业业态的关联性使原本分散经营的个体商户面临相似的市场环境和经营挑战，客观上形成了利益交集和协作需求。例如，北美、欧洲等地区的商业改进区（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就是这种利益整合的一种制度化表达，通过建立法定的商户自治组织，实现区域内商户共同出资、统一管理的运营模式（Meltzer，2012）。此制度设计体现了“商业共同主义”的理性选择逻辑，商户基于成本效益考量，通过集体行动降低个体经营成本，提升整体竞争优势，实现从

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转化 (Morçöl & Zimmermann, 2006)。

在感性层面, 社会互动与文化认同催生街区情感共同体的生成。情感纽带和文化认同是共同体形成的精神基础 (罗大蒙, 2023)。在日常经营活动中, 街区商业空间成为周边居民社会交往的重要场域 (帅满, 2019), 商户作为社区生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通过长期的面对面互动逐渐融入居民的生活世界, 形成超越买卖关系的社会联结, 增强了他们作为社区“公共人物”的情感体验 (李翠玲, 2025)。同时, 商户群体在应对共同挑战的过程中, 通过经验分享、资源互助、声援支持等非正式合作行为, 建立起基于信任和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 最终孕育出以文化认同和情感依恋为纽带的社区情感共同体 (Sutton, 2007)。

现有研究对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进行了丰富探讨, 但仍囿于“社区”这一传统分析单元, 缺乏对“街区”这一新兴治理场域中治理共同体建构机制的系统理论阐释, 从物质空间更新或行政管理优化的角度切入, 却忽视了作为开放性社会空间的街区中多元主体的情感连接与认同建构的过程。因此, 亟须构建一个在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场域下, 能解释在商业街区环境中治理共同体如何形成、维系的理论框架, 揭示城市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制与实现路径。

### 三、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城市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是复杂的动态过程。为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机制, 本研究借鉴互动仪式链理论, 提出“一链双环”分析框架, 包含“身份-情境”基础环与“议题-情感”动力环, 分别回应“谁在治理”和“在哪里治理”, 以及“治理什么”和“如何持续治理”等问题, 为理解城市基层治理新场域中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与共同体生成逻辑奠定基础。

#### (一) 理论基础: 互动仪式链上的共同体

互动仪式链理论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Theory) 由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 提出, 旨在解释社会互动中的情感能量和团结感的形成机制。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 人类能通过一系列的互动仪式来产生情感能量, 这种情感能量在群体内部循环和放大, 使个体在群体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而加强群体的凝聚力和个体的社会身份。互动仪式应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情感提升要素: 身体在场、对局外人设定界限、共同关注的焦点, 以及共同的情绪和情感体验 (柯林斯, 2009)。基于这些要素的互动会产生四种结果, 即群体团结、个体的情感能量、代表群体的符号, 以及正反双向的道德感。该理论关注情感能量和团结感的形成机制, 实现了松散的社会个体与有机团结的治理共同体之间的有效连接。

互动仪式链理论为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基础情境、行动过程和主体动

机三方面的理论支撑。首先，互动仪式链理论强调对情境的关注，基于对街区情境内商户、居民、顾客等多元主体日常交互行为的解构，逐步阐明生成共同体意识的要素机理。其次，互动仪式链理论对身份确立、情境强化、议题塑造、情感循环等行动过程的描绘，为街区治理行为的持续优化提供依据。最后，互动仪式链理论揭示了共同体的情感体验在强化个体联系、凝聚群体力量方面的关键作用，为有效动员商户个体实现从利己到利他的选择逻辑变迁并主动参与街区治理事务，提供了理论观照。

## （二）分析框架：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一链双环”框架

本研究聚焦街区治理的微观过程，构建“一链双环”分析框架，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基础，包含相互衔接的“身份-情境”基础环与“议题-情感”动力环（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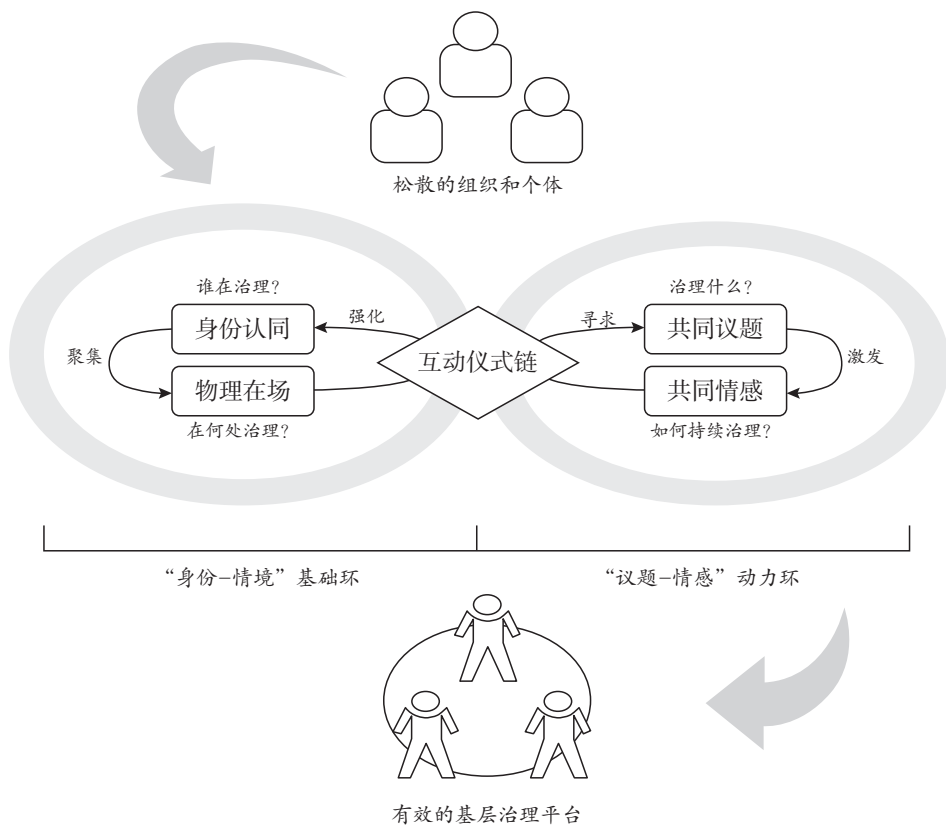


图1 “一链双环”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身份-情境”基础环的关键在于身份认同以及物理在场。对共同体成员的认知塑造与强化实现了对原子化个体的归拢与动员，推动其从“我”到“我们”的

身份认知转变，初步构建了形式上的共同体。第一，“身份认同”对应了互动仪式链理论中的“与他人之间划清界限”之需要，其往往通过“标签化”的群体联盟身份确认来实现。当获得某一群体的成员身份后，个体会将自己所属的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相比较，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产生积极认同，给予群体内成员更多正面评价（Bilancini et al., 2020）。在街区治理中，对身份认知的塑造能回应“谁在治理”的问题，赋予商户以街事会成员等身份标识能实现商户从经济主体到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转变。第二，“物理在场”的关键在于建立场景空间与集体活动的联系。柯林斯认为，仪式本身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尽管数智技术的应用正逐渐丰富远程参与的形式，然而具身在场依然是情感体验的有效保障。正如德雷福斯所指出：“我们对事物和人的真实感，以及我们与之有效互动的能力，取决于我们真实身体在背景中默默运作的方式。”（Dreyfus, 2001: 71）就治理共同体建构过程而言，行动者的身体在场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场景空间，并且在其中开展符合共同体精神的集体活动，以应对“在哪里治理”的问题。

“议题-情感”动力环的关键在于柯林斯尤为强调的共同焦点及共同情感体验。在已形成的、拥有共同体心态的群体中，培育对于群体效能的感知以及成员身份感的强化，能有效地延长集体兴奋的作用时间，推动共同体持续有效运行。第一，“共同议题”意味着共同体成员聚焦于能激发他们集体兴趣或公共价值感的议题，将个体的私利和差异化需求引导至面向整体的行动方向。对于街区商户而言，引导大家选取与其日常经营生活相关的公共议题，能自然地实现其营利性目标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联结，避免强迫式的、违背其利益的公共参与，能对“治理什么”的问题作出清晰可行的回应。第二，“共同情感”的关键在于满足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情感诉求，在从被动式参与向配合式参与、自主式参与的转型过程中，成员能获得满足感、认同感、自豪感等情感体验，巩固群体团结的内生动力。“团体在共同面对事件时分享反射性情感，以及彼此间共享情感忠诚时，往往会变得更加团结（Jasper, 2011: 12）。”由此可见，共同情感的培育是解决“如何持续治理”之间的合理答案，通过情感体验的积累与循环，为共同体提供持续参与的内生动力。

#### 四、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

为深入探究街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笔者所在研究团队通过长期驻点调研，选取上海市S区C街事会（以下简称“C街事会”）的创新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街事会的形成背景、治理架构、运作机制和实践成效。

## （一）研究背景及资料收集

街事会是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由街区内多元主体组成的街区自治组织，旨在推动街区事务的协商共治。作为一种城市基层治理的创新模式，街事会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广泛吸纳、引导街区多元力量加入街事会，聚焦环境卫生、公共秩序等领域开展决策和管理，有效提升街区治理和服务的精细化水平，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各尽其责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本文以C街事会的建设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案例选择的原则在于：其一，基础条件完备。S区是上海市中心城区之一，充分体现了城市人口规模庞大、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结构复杂、治理需求多元等典型特征，为研究街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理想的样本。C街事会位于S区H街道，是S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区域内商户数量密集、类型多元，具备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需求条件。其二，案例典型性强。街事会是S区全域推进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工作的重要实践，C街事会是H街道六大街事会中最具代表性的阶段性成果，频繁在S区有关部门会议、活动及新闻中被提及，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其三，一手资料丰富。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24年5月至11月以全覆盖理论团队专家身份，于S区H街道开展蹲点调研及追踪研究，通过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资料查阅及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课题组获取了大量一手数据。课题组共参与上海市、S区及H街道相关会议10余次，访谈了包括S区党政干部、H街道党政干部、街区和社区党组织书记、街事会商户代表、街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街区消费者等共计21人，形成访谈记录及其余文字材料共计30余万字。

## （二）案例呈现

C街事会位于上海市S区H街道的黄金路段，其主体是一条美食街（C街），包含一个美食广场及内外两条沿街商铺，从业人员近500人，共有商户78家，其中餐饮店占比近7成。C街是距离某国际级大型展览馆最近的商业街，毗邻地铁站以及市区面积最大的公园。近年来，随着会展经济回暖，该展馆每年举办展会的天数超过250天，C街成为众多外地展商消费的第一站，吸引了多种业态集聚。尽管如此，长期以来，C街面临着“有人流无客流”的窘境。作为已建成10余年的“老牌”美食街，其硬件设施和经营环境逐渐老化，一系列潜在问题逐渐暴露：环境卫生亟须改善、顾客等候区设施不足、广告位布局杂乱、缺乏公共休息设施和明确的导视系统；由于商户的流动性较大，C街始终处于松散经营状态，整条街区未能形成独特的风貌和主题。此外，尽管物理意义上的街区形态已经形成，但街区商户内部仍缺乏有效的沟通组织和平台，街区不仅未能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甚至面临集体行动的博弈困境。

2024年5月，H街道成为上海市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工作的试点街镇之一，由街道牵头在街区、园区、楼宇等区域开展底数排摸、组织覆盖、阵地建设等工作。C街区作为H街道的重要街区之一，其定位不清、环境脏乱等长期以来未得到改善的治理问题开始受到关注。2024年8月，在H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社区党委，以及管理中心牵头下，C街事会正式成立。从街事会的治理架构来看，这是一种以街区为单元、在党建引领下构建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创新模式。就治理主体而言，街事会构建了理事会、监督委员会、共建单位、外部顾问等多层次组织架构，形成党建引领下商户代表、居民代表、物业代表、职能部门代表等多元化参与格局，实现了从单一商户松散经营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就治理制度而言，街事会建立了涵盖决策、参与、监督的完整制度体系，通过街事会运行规则等规范性文件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形成定期评议、集体决策等制度安排。就治理机制而言，街事会构建了议事、服务、宣传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通过专题协商、联建共建、社会服务等形式，实现街区事务的有效治理。

## 五、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在“一链双环”框架下，C街事会的治理实践为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廓清了路径。在“身份-情境”基础环，街事会通过标签化的划界方式构建群体认同，利用物理空间阵地创造共同在场感；在“议题-情感”动力环，街事会围绕商户关切确定共治议题，通过持续回应商户需求增强情感认同。这一过程实现了从工具理性的机械共同体向情感融合的有机共同体的转变。

### （一）街事会构建互动平台：“身份-情境”中的治理角色转变及场景搭建

#### 1. 创建街事会：治理角色塑造与双重情感满足

在街事会创建以前，“互不相关的邻里”不仅适用于对现代社会中城市社区成员关系进行描述（桂勇、黄荣贵，2006），也是街事会成立以前商户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在街事会创建）之前，经常出现（一家）商户举报另一家商户占道经营的情况。比如，他认为你在商铺外面摆了桌子而我没摆，那我就吃亏了。”（C街区党组织书记访谈资料20240904ZSJ）这种非良性的商业竞争反映出C街商户之间缺乏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卢曼（Niklas Luhmann）认为，熟悉的世界为信任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人际间的信任也就易于达成（卢曼，2005）。商家们往往能在人际关系中建立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中发展社会关系（王茂福、史丰源，2024），实现以生意合作为基础的业缘、友缘关系建构。但由于C街商业业态复杂、商户流动性大，熟人化过程难以完成，导致商户之间的以利益链条为基础

的社会网络始终未能形成。“我们这一块的店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有时候还来不及熟悉，他就走了（停业）。”（C街事会理事长访谈资料 20240904FJL）

面对街区主体之间情感联系淡漠的现实，必须依托外力作用，引导商户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在H街道党工委指导下，C街事会迅速成型。对街区商户而言，创建并加入街事会的行为，能通过“贴标签”的方式建立明确的群体边界，将商户们区分为内群体（街事会成员）和外群体（非成员），从而赋予街事会成员双重层面的情感满足。第一方面的情感满足在于“脸面”的提升。对于同为街事会成员的商家而言，作为一种内向自我身份认同，街事会理事会成员能赋予商家一种“名分”。这是一种依据社会关系、建立在合规的仪式方式上的标记，这种关系能约束商户在群体内外的行为表现，使其在商业经营及社会参与中都扮演更为守序、积极的角色（翟学伟，2024）。“（加入街事会）能提升商户的自我约束能力，他可能会认为，我是有身份的，我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C街事会理事长访谈资料 20240904FJL）同时，街事会理事会成员也起到外向的社会形象塑造的作用。“加入街事会”这一行为能对商户产生一种“贴标签”式的身份认可，使其在日常生产经营中获得一定便利，这本身对商户而言便是有利可图的，属于一种“有脸有面”的社会强参与模式（张必春，2024）。在这一模式下，商户们不仅能守社会规则以维持自己的商业形象（即“脸”），也可以通过获取街事会理事成员这一身份标签来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即“面子”）。“加入街事会，本身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这块牌子在店里一挂，可能顾客就觉得我们是比较有责任心的店家，对我们的认可度也更高了。”（C街事会成员M经理访谈资料 20240930MJL）

第二方面的情感满足在于合作收益的获得。一方面，商户加入街事会能提升街区人气，吸引更多客流，带动商户的营业额增长。“我们街区和社区相邻，对很多社区店而言，他们本身也有通过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来吸引客源的需求，街事会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也会获得商家的积极支持。”（H街道党政干部1访谈资料 20240902CSJ）另一方面，赋予商户一定的官方认可，能巩固其良好的社会形象，吸引更多客源。例如，自C街事会成立以来，联合社区居委以及相关商家举办了“暑期嘉年华游泳‘世’锦赛”等活动，并向商家赠送了社企联动、公益服务的锦旗。“这对商家来讲可能是一种激励，体现出他是一个有社会公益心的经营者。要激发商户参与的积极性，关键在于搞清楚政府能为商户提供什么。比如，有些商户需要的是街道能为他背书，建立在周围顾客之间的良好画像。那么只有你给了商户这样的认可，他们才能有动力加入其中。”（S区党政干部2访谈资料 20250108SCZR）

## 2. 公共空间建设：物理参与提升参与实感

对商户等公共参与经验较为有限的新兴基层治理主体而言，具有场景感和情境融入性的物理空间能提升其与街区事务的共鸣共振感，培育其参与实感。近年

来，基层党建阵地的实体化现象愈发凸显，成为物理意义上的基层治理空间载体。依托 H 街道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工作的开展，C 街事会得以见证多个街区党组织阵地（即街事会阵地）落地，促进了街区服务、议事功能的运转。在服务方面，以 C 街区的“人间有味快充站”服务阵地为例，该阵地原本是通向美食广场的一处保安亭，经过改造后的阵地设置了饮用水、驱蚊水等日用品，以及冰箱、微波炉、空调等电器，为周边商户、新就业群体和居民提供服务。“有了这些功能区，不仅能让广场的品相变好，也让市民前来消费的时候能有休闲、打卡的去处。对我们商户来说，肯定能吸引到更多的客流。生意好了，大家能赚到钱，肯定更加支持街事会的活动，也会更积极地参与社区治理。”（C 街事会理事长访谈资料 20240904FJL）

在议事方面，开展以“临时议事厅”为特色的周期议事等集体活动，实现了物理空间与人类社会空间之间的联通，通过仪式化的行动进一步强化了集体认同。在传统社区中，居委会、业委会议事往往在社区居委、物业公司等具有半官方属性的场所中开展，以体现社区自治活动的公正性。然而与社区不同，街区商户多为个体户、小企业主，他们既往的政治参与经验较为有限，且日常忙于商业经营，缺少在固定地点开会议事的习惯。“如果大家在一个会议室里正襟危坐，大家可能会觉得不自在，很难放松下来谈问题。”（C 街区党组织书记访谈资料 20240913ZSJ）因此，为了纾解街区商户的参与困境，营造更轻松、开放的议事环境，C 街事会的周期议事场所并未局限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或社区党群服务站，而是在各家商户店里建起流动的“临时议事厅”，实现了基于“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基层协商议事模式（袁方成、张翔，2015）。“在一些非营业时间，我们会轮流把店里的空间拿出来用作议事厅，让大家就近参与。今天在你家，明天在我家，通过轮流的方式，不仅能增加大家的熟悉感和认同感，而且也比较公平。”（C 街事会理事长访谈资料 20240904FJL）“有什么事情，到议事厅去，共同商议一个结果，我们不是单独在战斗。”（C 街事会成员 C 经理访谈资料 20241021CJL）对参与街事会的商户而言，“临时议事厅”这一物理空间代表着一种可靠的、团结的协商符号，不仅增强了商户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凝聚力，也为后续的集体行动和共同决策提供了实践基础。

## （二）街事会培育自发性参与：“议题-情感”中的治理体验强化与情感循环

### 1. 框定议事焦点：下沉式的治理参与路径

消解利益冲突、协调多元利益关系以凝结共同利益、汇聚共同目标，是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的要件（孟燕、方雷，2023）。对于 C 街事会而言，由于其商业业态多元、商户类型多样、利益主体繁杂，培育商户的自发参与意识需要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街事会遵循从顶层逐步下沉到基层的治理路径，以议题的挖

掘、讨论与解决为线索，引领基层参与主体逐渐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街事会成立初期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决定我们应该关注什么问题。”（H街道党政干部2访谈资料20240902QZR）为了化解街区自治力量薄弱、自治经验欠缺的难题，必须采取由行政力量带动自治力量的方式，采用议题挖掘下沉、议事流程下沉这两个步骤，逐步引导商户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

第一步是议题挖掘下沉。在H街道党工委指导、社区营造社会组织协助下，C街区党组织书记、街事会理事长通过“刷脸”的形式，频繁走访街区内所有商户，上门询问其是否有经营困难及对街区治理的建议。“前几次别人还会觉得我陌生，几轮走访后，我和街区商户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熟了，商户愿意拿我当自己人，也愿意和我讲一些他们的看法。之后走访的频率就可以降下来，从一周几次，变成半个月或一个月一次，否则可能会影响商户的正常经营，起到反作用。”（C街区党组织书记访谈资料20240904ZSJ）第二步是议事流程下沉。在广泛收集多方意见的调研基础上，部分商户、物业公司、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方被邀请参与到街事会讨论。经过多次讨论，街事会梳理出现阶段治理的四大议题：商户位置指引不清，顾客不知道要去的店铺在哪里；缺乏公共休息区域，顾客找不到可以落座的地方；广告摊位杂乱无序，招牌随意摆放；整体环境有待改善，外摆（即餐桌椅户外摆放）、垃圾运输等问题突出。这些议题都以“如何提升商户经营效益”为核心，通过将日常的纷杂乱象进行归因，推动各方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和方案。

以外摆问题为例，C街区是一条美食街，每年一到夏季，各家餐馆推出小龙虾、烧烤等菜品吸引路人，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商家都通过外摆来招揽生意，桌椅越放越靠外，影响了路人通行。此外，每夜生意结束后，商家未能及时清扫一地的垃圾。整条街周围都是居民区，12345热线的工单源源不断。有居民打的，也有街上同类店铺打的。”（C街区党组织书记访谈资料20240904ZSJ）为解决外摆及垃圾清扫问题，C街区借助街事会成立的契机，首先确定街区能否外摆，再确定怎么外摆，继而通过街事会两次的讨论以及一次街区商户大征询，最终确认了C街区外摆方案。外摆方案提出，在每间商铺门口设置一个L形的隔离花箱，长度1.2米，外摆范围应控制在花箱区域1.2米内。“L形花箱的设置既维护了街区的环境美观，又为各商户明确了可外摆的范围及清扫标准。我们的要求是，商家必须把自己外摆范围内的卫生包干到位，否则可能进行处罚。”（C街区党组织书记访谈资料20240904ZSJ）在缺乏有效市场规范的情况下，商家可能通过恶性竞争以追求更高的利润，同时忽视由此产生的负外部性。然而，当市场规范明确且得到有效执行时，遵守规范不仅有助于内部化这些负外部性，还能实现更大的长期经济收益（奥斯特罗姆，2012）。因此，在外摆方案通过后，街区商户纷纷自觉遵守这一规定，使C街区实现了“12345零工单”的良好治理成效。

## 2. 情感体验循环：街事会生命力持续延展

要延续共同体的生命力，就必须回应商户的利益关切，增强其情感认同，激发商户对街事会共同体的正向情感，形成自我滋养、自我循环的参与动能。例如，在民国年间曾兴起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街区性商人团体“商联合会”。商联合会通过兴办夜校、设立防疫所、采取防盗措施等“行小善”方法，为商户谋取实际利益，提高其街区认同感，进而养成家园意识（彭南生，2012）。

对于C街区某餐饮店店主、C街事会理事会成员M经理而言，其参与街事会的情感体验始于个人需求，经历了解决问题的过程，最终转化为对集体的认同和回馈意愿。“我加入街事会不是为了将来能获得什么资源，或是让大家站在我这边。我认为街事会给了我一种参与感、认同感，我接受了街事会的帮助，也想通过加入街事会来促进更多问题的解决，帮助其他人，实现互利共赢。”（C街事会成员M经理访谈资料20240930MJL）M经理的餐饮店入驻C街区3年多来，遇到的最大困扰便是因商户位置指引不清导致客源流失。在街区党组织书记和同为街区商户的街事会理事长多次走访后，M经理意识到街事会也许有能力解决这一困境，于是将问题反映给C街事会。C街事会将这一困扰多家商户的问题列入四大议题之一，绘制了详细的街区地图并张贴在街区的4个入口，标明每家店铺的位置，并按照颜色进行分区，为顾客提供了清晰的指引。随着标示牌落地，C街区的客流引导规范性、便捷性有了显著提升，M经理收到询问店址的电话也少于往日，客流有所上涨。

出于对街事会的感激和认可，M经理决心加入其中，帮助街事会进一步扩充力量。“街事会帮我们解决了经营上的问题，我们很感动。我们也响应街事会号召，加入了街道的老年人助餐联盟，给快递小哥提供绿豆汤。有些老人家夸我们，说看着我亲切，像自己孙女一样，我心理上也很受用。”（C街事会成员M经理访谈资料20250703MJL）除了服务周边居民和新就业群体，街事会商户之间也会主动以“老带新”的方式，帮助新店主尽快融入街区环境。“街事会为我们这些第一次开店的新店主提供了相互交流、相互熟悉的平台。”（C街事会成员W经理访谈资料20250703WJL）

## 六、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机制创新

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需要面对以下三重挑战：如何激发商户参与积极性，如何使商户保持持续参与的动力，以及如何确保共同体的长效运行。C街事会的实践形成了三种相互支撑的实现机制，即角色重塑式的主体激活机制，循环下沉式的动能注入机制，以及引领托底式的制度保障机制（如图2所示），为应对上述挑战、实现街区治理共同体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参照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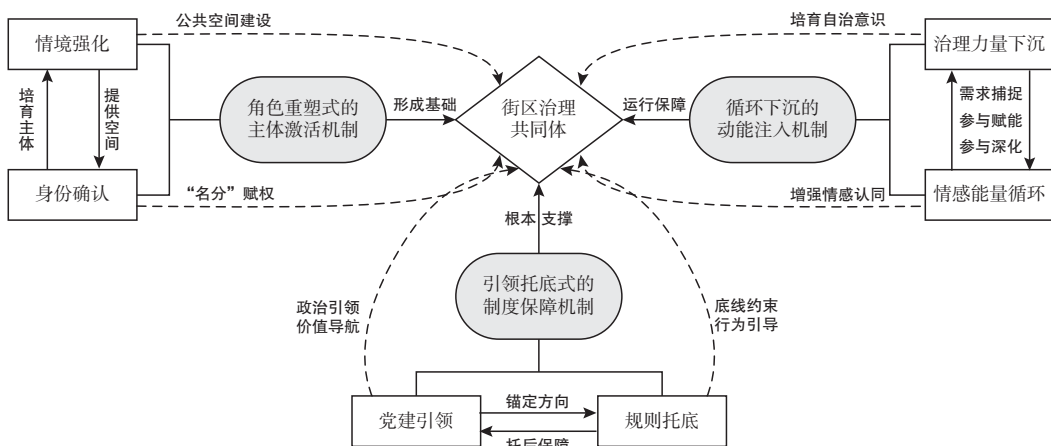


图2 街区治理共同体的机制创新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一）角色重塑式的主体激活机制

要有效激发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商户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激活街区主体的参与意识，必须通过对街区商户的身份与行动场域进行重构，激发商户从被动分散的经济个体转变为积极有组织的公共参与主体。因此，角色重塑式的主体激活机制区分为身份确认和情境强化两个相互支撑的维度。前者解决“我是谁”的认知问题，重塑商户的身份与关系；后者解决“我在哪里”的场域问题，为商户参与提供空间基础。

在身份确认层面，街事会建设通过重新定义商户的社会角色，实现从单纯经济主体到具有公共责任的街区成员的身份转变。如美国社会学家赛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所言，共同体是一种“社会连带和尊重的联合体”，其本质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具有共同身份意识的契约（塞尔兹尼克，2009）。街区共同体建设的要义之一在于将经济意义上的成员资格转化为可以获得社会连带和尊重的身份认同，主要通过内外双向作用来实现。从内向认同维度看，制度化的“名分”赋予能利用基层政治资源助推商户积累社会资本。对商户而言，身份的获得不仅改变了商户的自我定位，更在其逐利本性上叠加了共同体责任意识，实现了从“我”到“我们”的认知重构，为共同体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础。从外向认同维度看，街事会利用基层党组织和街道的形象背书与消费者及社区居民的公共评价，密切联系街区居民，建立一套维系街区关系的情感认同体系。“我很享受和周边居民做朋友。我这个店本身的定位就是社区店，和周边顾客的交流越多，我们越能扎根在这里，有一种在地感、归属感。”（C街事会成员W经理访谈资料20250703WJL）这种身份确认机制使商户从单一的经济角色扩展为兼具公共功能的社区成员，同时也促使商户间的关系从竞争或陌生转变为竞合共生的共同体。

在情境强化层面，街事会的建设与运行能重构街区的物理与社会空间，为商户提供践行其新的社会角色的公共场域。空间载体兼具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其自然属性指的是现实中具有地理和物理意义的实体空间，而社会属性则蕴含着社会、政治、伦理等层面的价值意涵（岳奎、曲秀玲，2024）。为了充分实现这种双重属性，街事会通过服务阵地建设与议事阵地建设，将原本单纯的商业空间转化为具有公共治理功能的共同体场域。服务阵地将商业过渡空间转化为具有公共属性的互动场所，创造了商户、就业群体和居民日常聚集的情境，使街区主体在日常交流过程中形成面对面的社会联系。而议事阵地则是基于商户的实际需求与实践经验所打造，流动议事厅等创新性议事场景突破了传统治理中固定场所的局限，将商户店铺轮流转化为治理空间。借由角色重塑式的主体激活机制，街事会建设能有效突破传统街区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商户参与不足、公共责任缺失等困境，将分散的经济个体整合为具有共同体意识的公共主体，为街区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 （二）循环下沉式的动能注入机制

在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当参与主体被成功激活后，如何进一步维持其持续参与热情和治理动力成为关键任务。循环下沉式的动能注入机制通过将治理资源和组织力量向街区基层下沉，同时激发情感认同与参与动力的自我循环，为街区治理共同体注入持久活力。

城市商业街区的公共参与主体庞杂，治理力量的下沉意味着治理方式的转变。街区党组织走进商户，融入街区日常，治理重心从行政推动转向需求回应，这不仅提高了治理的精准性，也为建立治理主体间的情感连接创造了条件。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的互动嵌合。行政力量主要体现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政府部门的资源支持，为街区治理提供制度框架和政策保障；而自治力量则源于商户的积极参与和主动贡献，是街区治理的内生动力和持久活力。“街事会确实培养了我们的集体意识。有时候顾客来我们这条街吃饭，他的印象不只是‘某家店怎么样’，而是‘这条街怎么样’。卫生是不是干净、车位多不多、环境好不好……这不是一两个商家可以独自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大家聚在一起，一起讨论、一起出力的。我们经常说要‘拧成一股绳’，创造一种共赢的局面。”（C街事会理事长访谈资料 20250703FJL）因此，治理力量下沉能避免行政力量单向干预可能带来的依赖性，同时克服自治力量缺乏指导可能导致的无序。

情感能量的自循环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克劳斯（Sharon R. Krause）指出，有效的公民参与不仅需要理性思考，更需要适当的情感投入，即“公民的激情”（Civic Passion）（克劳斯，2015）。这种情感不同于纯粹的个人情绪或非理性的群体情绪，而是一种基于公共利益、指向共同福祉的集体性情感认

同。情感能量循环的核心正是在于实现集体性情感能量的积累与释放。当街事会能有效回应商户诉求、解决实际困难时，商户不仅获得了经营上的实际收益，而且收获了被重视、被回应的情感满足。“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来走访，后来他们经常来，就算有些问题不能立即解决，但我们也能感受到人家在用心倾听我们的诉求，尽力帮我们反映，我们也很感动。”（C街事会成员M经理访谈资料20250703MJL）这种正向体验促使他们从被动接受帮助的受益者转变为主动参与治理的贡献者，形成街区治理中的情感能量良性循环。

循环下沉式的动能注入机制的关键在于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的有机嵌合，实现从上级推动到自主运行的转变。上级党组织的引领使基层治理可以最大限度地贴近群众需求，情感能量的自循环则有助于促进治理活力实现持续迸发。当越来越多的商户受到获得感的鼓舞而加入街事会时，他们不仅带来新的议题和资源，还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和行动能力，从而实现街区治理共同体的自我发展与完善。

### （三）引领托底式的制度保障机制

制度保障是街区治理共同体实现长效运行和稳定发展的根本支撑。一个具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亨廷顿，2008）。在街事会的治理实践中，引领托底式的制度保障机制是一种隐性但关键的支撑系统，表现为党建引领和规则托底相辅相成的制度设计。

一方面，在街事会的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作为街区治理的政治引领者和价值导航者，不仅把握整体治理方向，还整合各方资源，引导治理力量贯通基层一线末梢。“我们以往遇到一些经营许可的问题，都要自己去（和营商部门）沟通，但是现在有了街事会，街区党组织可以帮助我们反映问题，帮我们减轻了很多压力。”（C街事会成员T经理访谈资料20250703TJL）另一方面，恰到好处的制度空间留白能激发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创造力，在议题设定、参与主体与执行方案等方面预留适当的自主调整空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市场需求提供适应性机制。

然而留白并不意味着无序，规则托底恰恰为街区治理提供了底线约束和行为引导。这些规则包括制度化的议事程序、具体的行为标准、有效的监督机制。总体而言，党建引领为规则托底锚定了宏观方向，而规则托底又为党建引领提供了制度保障，形成了一套既有方向引领又有灵活弹性、既有底线约束又有创新空间的制度体系。作为街区治理共同体的支撑系统，引领托底式的制度保障机制避免了单纯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的僵化与低效，也克服了完全市场化自治可能带来的混乱失序。街区治理共同体能在明确的制度框架内保持活力创新，在党建引领下实现自治与共治的良性互动，逐渐迈向成熟与稳定。

## 七、总结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特定地理范围内，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组织形式，必须具备明确的治理空间边界、多元化参与主体、有效组织载体、共同连接纽带和制度化运行机制等要素。这些要素在党建引领下有机统一，实现公共价值、公共利益与公共精神的再生产。依托街事会等创新治理实践，街区治理共同体作为对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拓展延伸，正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展现出新的活力和潜能。街事会的实践表明，以集体身份和物理空间为基础，通过议事协商、经营互助、活动参与等一系列互动仪式，街区商户、社区居民以及基层党政机关之间能形成有效的互动仪式链，激发新兴基层治理主体的参与动能。

对治理过程中互动仪式链的描摹能深化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理论认知。治理共同体是建构产物而非先赋存在，这是在现代社会重新找回共同体的认知前提。在街事会的实践中，党建引领发挥着关键的统筹协调作用，它不仅提供价值引领和组织保障，还能为原本缺乏有机联系的市场主体提供互动平台和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托底下，原本分散的商业主体通过定期议事共商、商户间主动的经营互助、社区公益性的活动参与等仪式化互动，逐渐形成共同的关注焦点，在反复互动中强化集体认同和情感共鸣。这种仪式化互动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了参与者的实用性需求与象征性需求——商户们在获得实际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获得了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从而形成了超越单纯利益计算的情感纽带。

以街事会为代表的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实践模式的补充和创新。它不仅拓展了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体系向新兴领域延伸的可行路径，更深刻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空间复杂化、治理需求差异化的现实挑战。从实践启发来看，街事会模式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以下三个关键条件：第一，基层治理主体需要在价值和组织引领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创新空间。若治理主体缺乏能动性，互动仪式链便难以有效建立。第二，对新兴领域的治理主体而言，在行政命令和制度约束之外，还需要身份认同、情感动员等柔性制度对其参与态度进行培养。第三，街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通过持续改进的互动仪式来维系和强化，不能仅靠一次性的制度安排或阶段性的运动式治理来实现。

本文尝试开拓街区这一城市基层治理新场域的研究视野，然而，对于新兴领域治理主体的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在城市的街区生态系统中，商户虽然是街区治理的主要对象之一，但还存在着大量如骑手、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这些群体流动性较强、组织性较弱，如何有效地将其纳入街区治理共同体，建立更加包容和富有弹性的参与机制，成为应对基层治理挑战、提升街区治理效能的关键议题，也是未来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2012).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余逊达, 陈旭东,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Ostrom, E. (2012).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Yu, X. D., & Chen, X. D.,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陈水生、叶小梦 (2021). 调适性治理：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城市街区关系的重塑与优化. *中国行政管理*, (11): 13-22.
- Chen, S. S., & Ye, X. M. (2021). Adaptive Governance: Reshaping and Optimizing the Grass-Roots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Governance Focus Shift Downward.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1): 13-22. (in Chinese)
- 耿虹、李彦群、乔晶 (2022). 中小城市传统商业街区活化振兴营造策略研究——基于日本高松丸龟町商店街的经验启示. *国际城市规划*, 37(1): 124-133.
- Geng, H., Li, Y. Q., & Qiao, J. (2022). Strategy of Activated Construction of Original Commercial District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 Inspiration from Takamatsu Marugamemachi Shopping Street in Japan.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37(1): 124-133. (in Chinese)
- 桂勇、黄荣贵 (2006). 城市社区：共同体还是“互不相关的邻里”.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6): 36-42.
- Gui, Y., & Huang, R. G. (2006). Is Urban Community “Gemeinschaft” Or Neighborhood.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36-42. (in Chinese)
- 胡安宁 (2024). “家”“国”同此差序——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学分析. *学术月刊*, 56(12): 112-127.
- Hu, A. N. (2024). The Same Differential Order of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A Sociological Empirical Analysis of Family-State Isomorph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Academic Monthly*, 56(12), 112-127. (in Chinese)
- 巨云鹏 (2025-5-20). 上海探索新兴领域党的组织体系全覆盖. *人民日报*, 第19版.
- Ju, Y. P. (2025-5-20). Shanghai Explores Full Coverage of Party's Organizational System in Emerging Fields. *People's Daily*, p. 19. (in Chinese)
- 柯林斯 (2009). *互动仪式链*. 林聚任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Collins, R. (2009).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Lin, J. R., et al.,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李翠玲 (2025). 再造“附近”：邻里商铺与城市“地方”重构. *新视野*, (1): 98-108.
- Li, C. L. (2025). Recreating “Proximity”: Neighborhood Shop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Places”. *Expanding Horizons*, (1): 98-108. (in Chinese)
- 李沫 (2023). 基层治理共同体责任网络建构的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学习与探索*, (9): 42-49.
- Li, M. (2023). Realistic Dilemmas and Strategic Choices in Constructing Responsibility Network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mmunities. *Study & Exploration*, (9): 42-49. (in Chinese)
- 罗大蒙 (2023). 共享、互动与情感生产：城市社区邻里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理论月刊*, (11): 111-119.
- Luo, D. M. (2023). Sharing, Interaction and Emotional Production: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Urban Community Neighborhood Community. *Theory Monthly*, (11): 111-119. (in Chinese)
- 吕晋生、张晓文 (2024). 基层党建何以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基于A市D社区共同缔造行动的质性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5(12): 1-9.
- Lü, P. S., & Zhang, X. W. (2024). How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Lead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A Qual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creation Action of Community D in City A.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5(12): 1-9. (in Chinese)
- 孟燕、方雷 (2023). 价值驱动、结构优化与主体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江苏社会科学*, (2): 116-125.
- Meng, Y., & Fang, L. (2023). Value-Drive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Subject Empowerment: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mmunity.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 116-125. (in Chinese)
- 苗大雷 (2024).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机制——以商品房小区治理为例. *求索*, (1): 169-177.
- Miao, D. L. (2024).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Taking Commercial Hous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as an Example. *Seeker*, (1): 169-177. (in Chinese)

- 尼古拉斯·卢曼(2005). 信任: 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瞿铁鹏, 李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Luhmann, N. (2005). *Trust: A Mechanism for the Reduction of Social Complexity* (Qu, T. P., & Li, Q.,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彭南生(2012). 行小善: 近代商人与城市街区慈善公益事业——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讨论中心. 史学月刊, (7): 41-49.
- Peng, N. S. (2012). Doing Small Good Deeds: Modern Merchants and Urban Block Charity and Public Welfare: With Shanghai Road Business Association as the Center of Discuss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7): 41-49. (in Chinese)
- 塞尔兹尼克(2009). 社群主义的说服力. 马进, 李清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Selznick, P. (2009). *The Communitarian Persuasion* (Ma, J., & Li, Q. W.,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塞缪尔·P. 亨廷顿(2008).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 刘为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Huntington, S. (200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Wang, G. H., Liu, W., et al.,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沙伦·R. 克劳斯(2015). 公民的激情: 道德情感与民主商议. 谭安奎, 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 Claus, J. (2015). *Civil Passions: Moral Sentiment and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Tan, A. K., Trans.). Shanghai: Yilin Press. (in Chinese)
- 帅满(2019). 从人际信任到网络结构信任: 社区公共性的生成过程研究——以水源社区为例. 社会学评论, 7(4): 62-74.
- Shuai, M. (2019). From Interpersonal Trust to Social Network Structural Trust: Research on Publicity Formation of Shuiyuan Community.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7(4): 62-74. (in Chinese)
- 宋辉、张梦康(2025). 结构—情境—主体: 转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叙事逻辑. 中国治理评论, (1): 128-145.
- Song, H., & Zhang, M. K. (2025). Structure, Situation, Subject: The Narrative Logic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y Governance. *China Governance Review*, (1), 128-145. (in Chinese)
- 唐文玉(2023). 演进发展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一种本土理论体系框架建构. 学术界, (7): 75-84.
- Tang, W. Y. (2023).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n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a Local Theoretical System Framework. *Academics*, (7): 75-84. (in Chinese)
- 滕尼斯(2019). 共同体与社会: 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张巍卓,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Tönnies, F. (2019). *Community and Society: Basic Concepts of Pure Sociology* (Zhang, W. Z.,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王茂福、史丰源(2024). 互利共赢、社会关系与同级赊欠——以一个建材市场的实际运作为例. 社会学研究, 39(3): 67-88, 227.
- Wang, M. F., & Shi, F. Y. (2024). Mutual Benefit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Peer Credits: An Example of Building Material Market. *Sociological Studies*, 39(3): 67-88, 227. (in Chinese)
- 汪民安(2020). 现代性.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Wang, M. A. (2020). *Modernity*.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文宏、林仁镇(2022). 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中的情感生成逻辑——基于佛山市南海区的实践考察. 探索, (5): 141-151.
- Wen, H., & Lin, R. Z. (2022). The Logic of Emotion Gene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Community: A Practical Study in Nanhai District, Foshan City. *Probe*, (5): 141-151. (in Chinese)
- 吴理财(2020). 全面小康社会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5): 1-7.
- Wu, L. C. (2020). Develop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i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5): 1-7. (in Chinese)
- 吴晓林(2016). 从封闭小区到街区制的政策转型: 形势研判与改革进路. 江汉论坛, (5): 40-45.
- Wu, X. L. (2016). Policy Transformation from Gated Communities to Block System: Situation Assessment and Reform Path. *Jiangnan Tribune*, (5): 40-45. (in Chinese)
- 习近平(2018).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第95页).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Xi, J. P. (2018). Discourses on Adhering to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p. 95).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in Chinese)
- 习近平(2022-10-25).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新华社.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Xi, J. P. (2022, October 25).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in Unity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nhua News Agency.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in Chinese)
- 徐勇 (2024). 无治理不成共同体：政治学的视角. *理论学刊*, (4): 84-92.
- Xu, Y. (2024). No Community Without Governance: A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 *Theory Journal*, (4): 84-92. (in Chinese)
- 徐越倩、许文颖 (2024). 空间地理与动态能力：街区慈善生态形成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慈善基地的双案例比较研究. *社会政策研究*, (2): 81-92, 134-135.
- Xu, Y. Q., & Xu, W. Y. (2024). Spatial Geography and Dynamic Capability: The Dual Logic of Philanthropic Ecosystem Formation in Commercial Neighborhoods: A Case Study of Two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s in Hangzhou. *Social Policy Research*, (2): 81-92, 134-135. (in Chinese)
- 郝建兴 (2019). 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 *公共管理评论*, 1(3): 59-65.
- Yu, J. X. (2019).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Definition and Approaches.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3), 59-65. (in Chinese)
- 袁方成、张翔 (2015). 使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技术如何可能——对“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及其实践的理解.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4): 55-71, 127.
- Yuan, F. C., & Zhang, X. (2015). To Ru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ow Could Possibility by Technology “Open Space Technology” and Its Practice Understanding.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4): 55-71, 127. (in Chinese)
- 岳奎、曲秀玲 (2024). 空间载体的演进：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 *学习与实践*, (12): 13-21.
- Yue, K., & Qu, X. L. (2024). Evolution of Space Carriers: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Study and Practice*, (12): 13-21. (in Chinese)
- 翟学伟 (2024). 何谓“名分”？一项基于“关系性”的本土研究. *社会*, 44(6): 1-30.
- Zhai, X. W. (2024). What Is Mingfen? A Study of Status Based on Indigenous Perspectiv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ety*, 44(6): 1-30. (in Chinese)
- 张必春 (2024). “脸面观”视角下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逻辑分析. *中州学刊*, (2): 87-94.
- Zhang, B. C. (2024). Logical Analysis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e View”.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 87-94. (in Chinese)
- 张力伟、李宇晗 (2024). 责任型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基于D市S社区的个案分析. *探索*, (4): 42-53.
- Zhang, L. W., & Li, Y. H. (2024). Responsibility-type Community: A Vital Goal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S in City D. *Probe*, (4): 42-53. (in Chinese)
- Ansell, C., & Gash, A. (2008).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8(4): 543-571.
- Bilancini, E., Boncinelli, L., Capraro, V., Celadin, T., & Di Paolo, R. (2020) “Do the Right Thing” for Whom? An Experiment on Ingroup Favouritism, Group Assorting and Moral Suasion.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15(2): 182-192.
- Dreyfus, H. L. (2001). *On the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
- Jasper, J. M. (2011).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Twenty Yea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7: 285-303.
- Meltzer, R. (2012). Understanding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Neighborhoods and Boundar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71(1): 66-78.
- Mořçöl, G., & Zimmermann, U. (2006).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and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9(1-3): 5-29.
- Parks, R. B., Baker, P. C., Kiser, L., Oakerson, R., Ostrom, E., Ostrom, V., Percy, S. L., Vandivort, M. B., Whitaker, G. P., & Wilson, R. (1981). Consumers as Coproducers of Public Services: Some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onsideration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9: 1001-1011.
- Sutton, S. A. (2007). *Merchant Effects: Neighborhood Entrepreneurs, Agents of Revitaliz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Planning, Kansas City, MO, United States.

责任编辑：李棉管

# 英文目录与摘要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9 No. 2, 2026

## ● SYMPOSIUM: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 and Service Efficiency

Forty Years of Policy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in China's Public Services: A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 Ning Guo & Xiaoping Jiang

**Abstract** Equitable and accessible public services serve as a vital hallmark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onstitute the social cornerstone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280 national-level public service policy documents spanning from 1985 to 2025,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knowledge map of China's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It presents and explores the objectives,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s within China's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hina's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having undergone a gradient evolution characterized by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to "exploration of universal benefits" to "advancement towards equalizatio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policies demonstrate a four-dimensional dynamic pattern: demand progression, value realignment,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evolution reflects the innovative experience of public service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elucidates the inherent logic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ecurity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s; Policy Evolution; Policy Innovation; Knowledge Graph

How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Affects Citizen Satisfa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ocial Survey ..... Juan Du, Ziyang Li & Xufeng Zhu

**Abstract** As government performance continues to improve, how to further enhance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ervices has become a central concern for both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government-citizen interactions makes it possible to mov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centered explanatory framework, redirecting scholarly attention toward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in the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as a more effective explanation for citizen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introduces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as a core concept, defining it as citizens' composit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based on the spatiotemporal separation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We develop and test competing hypotheses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influences citizen satisfaction. Drawing on the 2019 China Social Governance Survey (CSGS) and manually collected dat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spatial, temporal, and social distance on citizen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ater the geographic and 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higher the public's satisfac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 whereas narrowing social distance does not lead to increased citizen satisfaction. Moreover,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affects citizen satisfaction through shaping public expectations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reconstruct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government. Further,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varies with citizens' political identity. This study offers decision-makers a novel perspective on the sources of citizen satisfa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supports more precise and responsive public management.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Citizen Satisfaction;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Citizen Expectations

How Do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Influence Citizens'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 Yabin Du & Liang M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government presents both new chances and challenges for social equity. There are still compe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a 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government and social equity. Using three waves of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data combined with provincial-level data,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 capacity influences individual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itizen-government interaction experienc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dual digital divid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First, provincial-level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 capacity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dividual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with service accessibility and service effectiveness playing crucial roles, while the process of service handling shows no significant effect. Second,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 capacity promotes citizens'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through improv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citizen-government interaction, including perception of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perception of procedural fairness, perception of service quality, and percept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hird, while the digital access divide does not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the digital usage divide induced by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age differences leads to the varying impact of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on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These findings provide preliminary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in promoting public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and contingent nat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

**Key Words**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Digital Government; Social Equity; Citizen-Government Interaction; Digital Divide

## ●ARTICLES

Strategy Types and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Policy Redesign: A Process-Tracing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

Xiaoou Man & Yang Yang

**Abstract** Policy design is a specific form of policymaking that shapes policy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Combining the dual attributes of a rational-technical instrument and a value-oriented pursuit, it serves as a key link between policy intentions and policy practice.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policy design elements at specific points in time, rather than treating policy design as an integrated whole and examining, from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its adap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over time.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policy redesign and focuses on the robustness that policy design exhibits in the course of adjustment. Based 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intervention targets and ac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identifies four strategic types of policy redesign: static substantive redesign, static procedural redesign, dynamic substantive redesign, and dynamic procedural redesign. It further constructs a four-stage mechanism consisting of issue context, goal iteration, tool adaptation, and policy feedback to explain the dynamic generation of policy redesign strategies. The study not only responds, at a theoretical level, to the classic question of how policy design evolves, but also reveals, at a practical level, how policy redesign is realized through adaptation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nd timely adjustment. Future policy design should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tic robustness to dynamic adaptation, so as to further enhance policy adapt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Key Words** Policy Redesign; Strategy Type; Policy Change; Process Tracing

..... Qixing Mo & Zijie Shao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public policy in the modern political ecosystem increasingly relies on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with policy narratives serving as a key guiding tool.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largely overlooked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narratives influence policy 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particular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rrative frames and an audience's prior knowledge. This study combines an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xperiment wit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employing a 2 (episodic vs. thematic narrative frame) × 2 (high vs. low policy familiarity) within-subjects design (N = 60) to disentangle the effects of policy narratives at both physiological and subjective levels. Our core finding reveals a stark dissociation between physiological and attitudinal outcomes. At the physiological level, the narrative fram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episodic frames, focusing on individual stories, induced stronger neural activity than thematic frames presenting macro-data. At the attitudinal level, however, this neural advantage vanished. The narrative frame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inal policy acceptance or information memory, while prior policy familiarity emerged as the sole determinant of these outcomes. We further found that watching policy news in an official media forma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articipants' overall emotional arousal. We thus propose a "trigger" hypothesis to explain this paradox: in the low-arousal context created by official media, policy narratives fail to facilitate deep cognitive processing, instead merely activating audiences' preconceived judgments based on prior experience, cognitive engagement and emotional arousal in moderating narrative effectiveness and offer new insights into the applicability boundaries of the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hypothesis within the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Key Words**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Policy Narrative; Policy Identity; EEG Experiment; Survey Experiment

“Party-led Collaboration”: The Cooperation Mode and Organization Mechanism of Mega Projects under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Party Building ..... Zheng Wang

**Abstract** Collaboration is a wicked problem for any modern organization.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hina to improve social livelihood and promot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mega projects posses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ystematic nature of tasks, strong time constraints, and cross-institutional nature of tasks, and require a cross-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model to be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party building, the “Party-led Collaboration” is initiated, established, and operated by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innovativ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party are constructed and us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major projects. The “Party-led Collaboration” has realized the adjust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the upgrading of departmental task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 righ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trong incentive correlation based on the status of party members, thereby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ga projects in a highly connected collaborative form. As a framework model for cross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the “Party-led Collaboration” is not a simple replacement for internal collaboration models such as work teams and leadership groups, but rather a supplement and modification to address major cross institutional tasks that are beyond the scope of internal collaboration. On the one hand, “Party-led Collaboration” provides a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at the meso-level for “how to effectively govern mega projects”, forming the meso-level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China's goo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high-level promotion to complete unconventional tasks; On the other hand, “Party-led Collaboration”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which helps to clarify the major proposition of “how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Party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Key Words** Party-led Collaboration; Mega Projects; Unconventional Tasks; Party Building Lead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Building Governance Communities on Commercial Streets; Expand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Beyon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 Limei Gu & Yuquan Li

**Abstract** Urban commercial streets have become as vital to grassroots governance as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yet face a key challenge: transforming competing merchants into collaborative collectives. Examining Shanghai’s C Street Council through a “one chain, two loops” framework based on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theory, this study reveals how such governance communities are built. The “identity-situation” loop cultivates street identity through role-shaping and strengthen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via spatial design and co-presence. The “issue-emotion” loop channels governance energy by focusing on shared concerns and building emotional solidarity. Through role-reshaping activation, cyclical momentum inj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ing, the Street Council balances market logic with public values, demonstrating a local pathway from fragmentation to integration, from transactional ties to emotional bonds.

**Key Words** Commercial Street Governance Community;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mmunity;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Urban Governance

How to Resolve “Wicked Problem” in Grassroo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A Case Study of Housing Expropriation Events ..... Bin Lin & Hong Wen

**Abstract** The compensation for demolition and expropriation is facing difficulties in redistributing benefits, which has become a microcosm of the “Wicked Problem”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differs from the expla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power and interest ga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but proposes a new explanation of “combined oper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execution. Deeply describe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promoting housing expropriation and compensation work around the most iconic demolition event in China.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grassroot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dopt a variet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methods, combining standardized execution, dynamic governance, and creative execution to solve “Wicked Problem” in a phased and targeted manner. Behind this is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redirec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sues to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 shaping rigid rules for the public, and releasing limited flexibility in internal operations of the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flexibly adapt to changes in group structure and interest pattern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combination oper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which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addressing “Wicked Problem” under normative constraints and enriches the explor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ory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is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optimizing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policies and improving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system.

**Key Wor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Wicked Problem; Housing Expropriation; Combination Operation

Can Unified Regulation Prevent Corruption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Evidence fro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 Qiaolan Liu, Fei Luo & Conghu Wa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ory systems. Authorities must advance contingency-

based regulatory reforms in response to evolving external conditions. However, critical questions remain empirically untested; whether the contingency reform of the regulatory system can enhance regulatory efficiency, and how do its adaptive features correlate with reform effects. This study leverages unified regulatory reform—an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to centralized public resource trading—as an analytical foundation. Focusing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s most market-oriented, resource-intensive, and reform-progressive region of regulatory systems for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we employ a quasi-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empirically examine whether unified regulation prevents corruption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Key findings include: (1) Unified regul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corruption, reducing annual duty-related crimes by approximately 4 cases per 10,000 public officials; (2) Moreover, the effect of corruption preven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areas with a higher initial level of corruption; (3) When unified regulation covers two types of projects, the effect of corruption prevention reaches its peak; (4) Unified regulation of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achieve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ve transfer method has a more significant corruption prevention effect than that achieved through the local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 method.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advances a contingency perspective on aligning regulatory systems with contextual demands. Empirically, it provides the first systematic evidence of whether unified regulation prevents corruption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offering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regulatory transformation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Key Words**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Unified Regulation; Policy Evaluation; Corruption

● **THEORETICAL REVIEWS**

The Effects of Local Officials’ Tenure: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

..... Can Li & Yujie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synthesizes the governanc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local officials’ tenure influences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firm behavior based on research on such impacts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Drawing on 252 relevant studies, we find that research on local officials’ tenure reflects the refinement and evolution of assessment and appointment systems for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ing cadres. The focus of research has progressively expanded from singular regional economic indicators to encompass diversified metrics such as regional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micro-level behaviors of entities like firms—including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ocal officials’ tenure affects the promotion incentives and social capital available to them, which in turn shapes their attention allocation across multiple goal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governance. Meanwhil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dividual attributes of officials, and firm-specific traits potentially moderate the actual governance effects of local officials’ tenur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goals during local officials’ tenures, leverage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onduct in-depth mining of data on local officials’ tenures and firm behaviors, decompose governance effects across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local officials’ tenure exerts its influence.

**Key Words** Local Officials’ Tenure; Governance Effects; Regional Development; Firm Behavior

# 公共行政评论

双月刊，2008年创刊  
第19卷，第2期（总第110期）  
2026年4月15日出版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imonthly, Since 2008  
Vol.19 No.2  
Published in April 2026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协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

社 长 肖 滨  
主 编 朱亚鹏

联系电话 020-84113029 020-84038746

电子邮件 jpachina@163.com

编辑出版 《公共行政评论》编辑部  
(广州新港西路135号; 邮编510275)

印 刷 广州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传 真 020-84111478

网 址 <http://jpa.sysu.edu.cn>

Administrat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onsors Sun Yat-sen University

Supporters Centre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ety

President: Bin Xiao

Editor in Chief: Yapeng Zhu

Tel: 86 20 84113029 86 20 84038746

Fax: 86 20 84111478

Email: [jpachina@163.com](mailto:jpachina@163.com)

Website: <http://jpa.sysu.edu.cn>

Edited by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135 Xin Gang Xi Road, Guangzhou, China. 510275)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399, Beijing, China)



刊号 ISSN1674-2486  
CN44-1648/D

邮发 国内46-364  
代号 国外BM8839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定价: 20.00元

ISSN 1674-2486



9 771674 248265

04>